

圍繞上一期五位編委在本刊創刊十五周年的三篇短論，本欄有三位讀者做了回應。我們特別要感謝十五年來一直訂閱本刊的陳家琪先生，一方面他直陳大陸讀者對《二十一世紀》的感受是「總覺得隔着層甚麼」，「興趣是越來越淡漠」；另一方面，又反思大陸學者在生活變得好多了時，是否在「忍受」與「必需」的自我辯解中變得越來越明智？確實，有不少朋友向我們表達了與家琪先生同樣的批評意見。作為編者，我們須要認真檢討原因、提出改進措施。時值歲末，我們期待在關心本刊的作者和讀者支持下，《二十一世紀》在新的一年，逐漸展現新面貌和吸引力。

——編者

我們是否正在變得越來越明智？

《二十一世紀》創刊到現在，十五年過去了。我似乎記得自己是從創刊號一直讀到現在的一位讀者。老實說，興趣是越來越淡漠，大部分情況下只看目錄或隨便翻幾下。但還是照例在訂閱，總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窗口。陳方正、金觀濤、劉青峰三人文章中說現在辦刊，「文章越來越專業，尋找公共話題一天比一天困難」（《二十一世紀》2005年10月號）。但這似乎並不是我淡漠的原因。原因還在自身。如何通過對自身的檢討來記錄和認識我們這個時代，總覺得《二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十一世紀》和我的感受隔着層甚麼。

在陳、金、劉的文章中，用很激動人心的筆觸回顧了上世紀80年代。那也就是我們這一代學人初露鋒芒、施展拳腳的時代。他們在文章中用了「啟蒙」這個詞，這說明那時的我們生活在一種激昂的政治狀態之中。只要人不得不過群體生活，而且群體生活要求着某種政治的正義性，正義就始終是一個「啟蒙」的主題。我們那時候團結一致、盡心盡力，是因為這個「主題」是明確的。

當生活的整體性喪失之後，當政治「遠離」了我們的生活之後，我們當何以生活——如果哲學與民主都可以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話，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我近來一直在讀「希臘化」（城邦解體，政治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無關）時期的書，在思考斯多葛主義、伊壁鳩魯主義和犬儒主義們所提出的問題，藉以反觀自身，以求在自己身上完成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一種「處世哲學」的轉折。這也是一種生活的現實，但似乎與陳、金、劉文章中所說的「深入探討民主自由的理念，……以使國人廣泛認識和信服」有所

不同。我知道這和我個人的消沉有關。

我很喜歡他們文章中引用狄更斯的那段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平心而論，與我們內心生活非常踏實、充滿激情的年代相比，現在生活是好多了，而且似乎恐怖也在減弱（比如畢竟可以說一些不同的話了），但人們（至少是我）對苦難卻變得越來越敏感了，於是反而覺得一切大不如前。

問題有兩個：一是當「代議制民主與自由權利」說到頭也不過是對國家而言的「盜亦有道」，並不會使盜賊變成「好人」時，我們自己從哪裏獲得自己作為一個「好人」的「道德身份」？與此相關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也許，不管是因為甚麼，我們是否正在變得越來越明智——這首先指的就是不要仇恨，拒絕報復，鄙視貪婪這些實際上並不「明智」的行為。至少有這樣兩個命題是我們不得不認可的：為了贏得善，寧肯忍受惡；個體的惡是整體的善所必需的。假設就是這樣，在「代議制民主與自由權利」對我們來說還很抽象的情況下，在「忍受」與「必需」的自我辯解中，我們

是否正在變得越來越明智（一種非道德判斷的明智）？

上海 陳家琪
2005.10.28

政治文明這片「最短的木板」

金耀基先生的文章中說：「二十世紀中國在制度現代化上，有太多的試驗，太多的失敗，所以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想像，對我而言，是過多想像力的想像了。」（《二十一世紀》2005年10月號）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會有甚麼樣的前景？這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中國的確還存在着諸多歷史遺留下來的以及新產生的問題，特別是制度方面的問題。

管理學上有一個著名的「木桶原理」，講的是木桶的容量不取決於最長的那一片木板，而是取決於最短的那一片木板。同理，中國現代性建設的成敗不取決於發展最好的那個因素，而是取決於發展不好的那個因素。對於當代中國而言，經濟增長是那片最長的木板，而政治文明則是那片最短的木板。而這片「最短的木板」卻是萬萬不可以短的。這個「最短的木板」的問題不解決，無論我們所取得的成績多好多大，都有可能毀於一旦。中國現代性建構的關鍵在於這種快速的發展是否具有生態上和政治上的可持續性或曰永續性。

要實現可持續的發展，迄今為止，除了民主和法治，似乎沒有其他更不壞的方法。在這一方面，台灣是中國的一面鏡子——民主的鏡子；香港是

中國的另一面鏡子——法治的鏡子。

北京 馮務中
2005.10.31

東方文明的艱難時世

許倬雲在追問「明日誰主蒼茫」時（《二十一世紀》2005年10月號），預設了兩個答案：「人類文明是為西方殉葬？還是另行開闢新的境界？」對於前者顯然不便或不忍多說，對於後者也只說到「在『東方』再起時，『東方』能否提出新的闡釋，將東與西整合為未來人類的共同文明」，連謙謙風度都是東方式的——但願文明之間不再衝突。

許先生「科學在東方是呈現為『科學主義』，幾乎當作一種信仰。民主呈現為暴力的民粹，資本主義呈現為追求私利的貪婪」之說，首先表明了對於西方文明「科學、民主、資本主義」的認同，而探究它們來到東方就一齊變味的原因被置於其次。

魯迅在〈這個與那個〉一文說，在中國歷史上，「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可見並不分甚麼東方、西方的。

設想有傑出學者設計了文明未來的兩類前景，一類是較長期的遠景、較完善（例如煥然一新的東方且將西方整合之）；另一類近期可見，卻不能盡如人意，就是說許先生「問明日誰主蒼茫」中的「明日」概念，可能是很長的或者是較短的時間，人們會傾向哪個呢？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好回答得多。

杭州 黃力民
2005.11.1

鄉村建設派的尷尬

英雄最無奈的就是生不逢時，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派正是這類悲劇英雄（參見曹立新：〈走向政治解決的鄉村建設運動〉，《二十一世紀》2005年10月號）。

二十世紀20、30年代是中國歷史最為風雲變幻的時期，如何解決農民問題成為各派勢力的分界點。國民黨作為既得利益的派別主張順其自然，共產黨作為對立派則主張推倒重來，鄉村建設派既不願與前者利益共謀，又認為後者會鬧得血流成河，所以期望另闢蹊徑，通過和平、漸進、改良的方法來救農民於水火。然而，兩邊不靠的策略使鄉村建設派發覺超然變成了茫然、蹊徑變成了夾縫、獨立變成了孤立。既然鄉村建設派不希望受到政治勢力的控制，這就促使他們排斥國民黨的支持，從而也就失去了強大權力與豐厚物質的支撐。他們對共產黨暴力手段的否定也使他們無法帶給農民直接的利益。鄉村建設派提倡的漸進式改良，雖然從長遠看是成本最小、最為有利的改革途徑，但是在那種革命激情蕩漾的年代，必定會被懷有暴富念頭的農民所擯棄。於是鄉村建設派尷尬地發現，不但他們反對的或不願依靠的勢力在袖手旁觀甚至橫加阻撓，連他們一心幫助的對象也最終棄他們而去。

武漢 黃鎔
2005.11.1